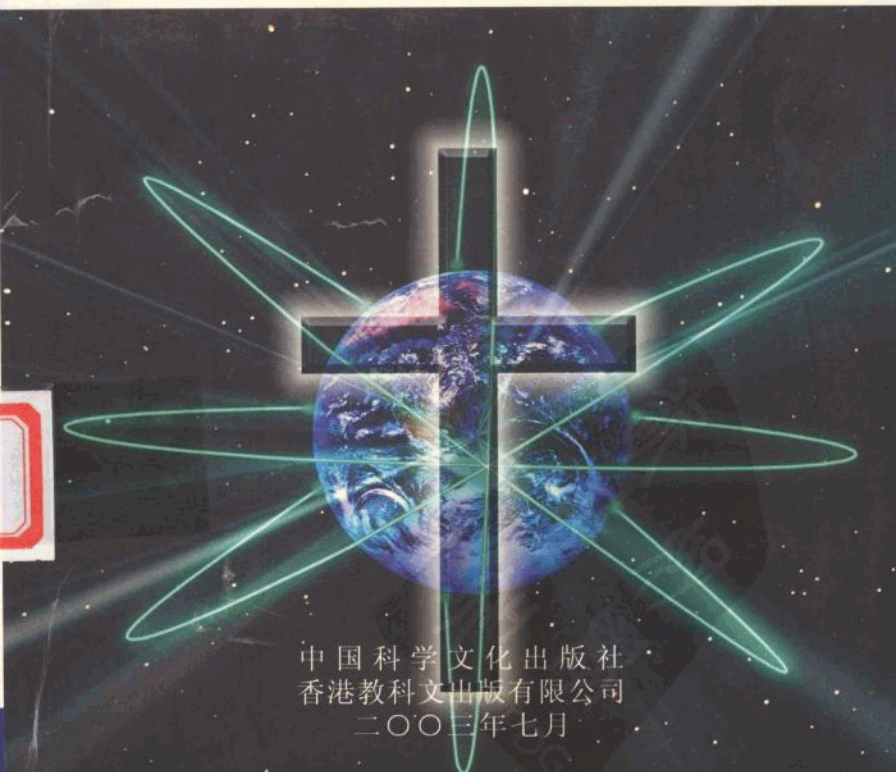


WORTH AND INSTRUMENTALITY

价值与工具

Writes by SI Han-wu

© 司汉武 著



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香港教科文出版有限公司
二〇〇三年七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孔子

人是会制造并利用工具的动物

——卡尔·马克思

知识与权力本为一事，在行动中最有用的，
在知识方面就是最真的。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
行动中则为法则。

——弗朗西斯·培根

……真理的价值和意义不在它们本身，而在
它们所造成的活动及其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

——约翰·杜威

自序^①

理性问题一直困扰着每一个思想家。虽然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把理性界定为人类的特有禀赋并提出了“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著名论断。但迄今人们对理性的了解仍极为有限。康德应说是以理性为重点研究对象的第一位哲学家，但其后不久，便出现了如同理性反对宗教一样，甚至把理性与宗教上帝一同抛弃的非理性主义的第一次崛起。当尼采狂呼“上帝死了”时，针对的并不是宗教中的上帝而是被视为人类特质的理性。究其质，乃在于对人类所特有的理性的困惑。

如果说康德把理性纯粹化为一种脱离存在的现实合理性的思维的超拔，并在论证这种理性的普遍有效性时发现了理性（先天综合统觉）的先天不足以及认识所必然导致的逻辑悖论，那么，韦伯则面对存在的现实合理性，把理性视作在社会中活动着的人的理性，并在这种理性活动中考察作为理性二元构成中的价值和工具、实质和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提出了价值理性（亦即实质合理性）与工具理性（形式合理性）的社会性课题。

笔者认为，理性主要根源于人类天然禀赋的认识能力。这种

① 该序原为笔者发表的一篇基础性论文，题目是《工具、价值与理性重建》，编入本著时，作了必要的修改。见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一期，第17-22页。

能力优于动物之处在于超验的抽象思维。这种抽象思维足以造就我们用于勾通信息的语言和文字。人类抽象能力转向自身时便形成自我意识，并由自我意识形成我们现在称之为理性的东西。因此理性是人类认识转向自身的成果，由这一成果的形成使得人的行为成为有目的、有计划、有技术手段的行为，从而也成为理性的行为。在现代意义上，人们对理性的认识，由于单方面强调其积极价值而忽视其消极作用，或者单方面看到其认识论作用而忽视了它本身所固有的本体论意义。而这一积极方面恰是康德和韦伯所共同重视的。康德把本属人类所独具的理性作为世界的最高法则，并对这一法则做了难能可贵的前瞻性展望——把人类的自由与自然等量齐观^①。

纯粹理性主要从人类非功利的角度考察认识过程及其成果即知识何以可能，以此来解决理性（主体）与自在之物（客体）之间难以弥合的对立，但这种解决以自在世界的不可知性和先天统觉的无限性而告终。康德试图把这种解决贯彻到价值世界的道德判断中，最终也没有完成人对自己的绝对立法，知行矛盾依然故我。韦伯纯粹放弃了对人类认识的逻辑超拔，而从理性的社会功利目标出发，来寻找对价值问题的解决，但如同康德对纯粹理性的研究成果一样，最终也没有找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统一和协调的有效途径。他之“为世界祛除巫魅”的理性化任务也没有完成，却从中发现无论是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都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异化。他曾悲观地写道“……我们现在已经完全被卷入了这样一种进化（形式或工具理性化）过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怎样促进和加速这一过程，而是设法反抗这个机器，免于灵魂被分割

① 康德认为：“人类理性的法则……具有两个对象：即自然和自由……这两种法则最初表现为两个不同的体系，但最终却归结为一个哲学体系。”参见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M），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69 页。

标价出售，摆脱这种至高无上控制一切的官僚式的生活方式，以保持人类中一部分人的自由”^①。理性本身是人类自由的体现，但这种体现一俟成为行为的工具和价值主宰时，都无可避免地对人类复又造成异化，由此人们看到的是作为工具和价值依托的科学理性精神与宗教伦理精神共同凝成的人类文化的双重效应。

“理性是有机巧的”，理性的机巧在于它的间接活动，它让事物按照它们各自本性相互影响，自己并不直接参与他们的活动，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②。理性的间接性活动正是表明了理性的工具价值。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类行为与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目性以及对实现这目的的途径和手段的选择即工具性往往使理性的天平发生倾斜：要么追求目的的实现而放弃对于工具和手段的重视从而使人类行为呈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工具非理性倾向；要么工于对工具和手段的重视，使工具偏离价值目标从而把人类也异化成工具使之陷于非理性的价值泥潭。西方社会中价值多元化和文化非理性倾向的出现，与东方一元文化下社会体制缺陷所导致的难以遏止的社会腐败，不正肇始了理性的两种异化后果。

韦伯把理性简义化为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并不是唯理论所确立的那种独立的固定的思维公设，而是生活乃至社会的和谐性。它作为社会互动中的理智习惯存在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其中本就包含着人们对自为价值的认定与追求。价值本身所以是自为的，由于它与人类特定的存在相关涉，离开了人类及其特定存在状况，任何价值都是子虚乌有。如果说宗教对人的终极关怀在于使人们摆脱狭隘的功利的束缚，便于灵魂有所皈依而不致放浪形骸，那

① 转引自 R. 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一幅知识分子的肖像（M），纽约：1962 年版第 464 页。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3 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第 394 页。

么这种终极关怀所提供的价值目标，并不能使人们彻底摆脱对现实目标的追求，亦即宗教终极关怀所提供的价值是预设的、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终极的、绝对的。价值之为价值，乃是价值主体自为地设定的，但理性往往把这种本为相对的东西视作绝对，并有意支配自己去不遗余力地追求它。在这种追求中，工具理性已成为位居其次的东西。当我们对哲学作价值论的考察时，不难发现，任何价值，由于与人类需要一一对应的特征，而不可能成为终极永恒的东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相对论所蕴含的本体论和价值论意义。薛定谔指出，“同样的元素，既能被用来创造内部世界(精神世界)，也能被用来创造外部世界(物质世界)^①。这样先哲圣智所创立的价值体系只能是自为的价值预设，任何把自为的东西当作自在必然性(异在)并主宰整个人类的价值理性的做法都会招致灾难。

价值理性所固有的特征可以归结为：1、过分强调意义世界而远离甚至排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这为宗教和社会理想主义所共有。价值理性的这种特征只许人们服从外在目的的合理性，拒绝乃至禁止理性对这种价值做新的探索。从而使价值把人仅仅异化成实现价值的工具。人类文明史上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及与科学思想的种种对抗都是价值理性的具体反映。2、过分强调外在规范的合理性而忽视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价值理性社会化的直接后果是伦理理性和社会理性，它们以非理性的形式进入人的情感世界使人们对价值的追求带有狂热倾向，这种狂热往往会偏离理性所固有的理智水平，只以价值充任工具，使得既定的价值目标成为主体获得某种功利需要的手段，将价值理性嬗变为工具非理性。任何社会革命都以价值理性为其先导，但由于价

① [俄]B. B. 纳里莫夫，关于哲学发展道路的沉思 (J)，哲学译丛[北京]，1994 年第四期，第 16-22 页。

值理性所固有的不足(从而也是人类理性之不足),人们往往失去对价值实现的途径与手段的关注,使价值理性的实践过程,不仅无助于该目标的实现,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3、价值理性在社会领域中,促使人们尤其是政治家精妙于制度而疏于对社会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特征在宗教统治和封建王权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最终仍难以避免价值理性到工具非理性的异化而造成的王朝更替。4、价值理性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社会文化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价值化、伦理化和政治化倾向,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充斥着工具非理性的痕迹。甚至对纯为工具理性精神(及其成果)的科学界也到处留有价值理性的印痕。价值理性的这种异化,造成二十世纪末以社会腐败,世界犯罪和贩毒活动为主要表征的工具非理性主义变成了人类的巨大威胁。价值理性在以价值理性为最高追求的社会中,不仅没有获得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反而严重阻碍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由韦伯天才地预见的理性的异化后果正在明显地突现出来。价值的绝对合理性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

工具理性是理性对价值目标的现实体现。这种体现不以自为价值为至上追求,把精力投入到对价值目标实现的途径的选择和手段完善上。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所走过的路途正是工具理性化的道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直接导致了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随着这一进程的实现,人们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个性的解放,也成为社会性主题突兀出来。与其说这是对人的自然性的张扬,毋宁说正是由于社会的工具理性化导致了人们对自身的发现。由自由意志到天赋人权,由皇权专制到三权民主,西方社会中价值非理性倾向和社会建制中的工具理性化倾向亦步亦趋,显示出人类逐步迈向现代社会的基本轮廓。

二

工具理性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理性的工具化，在这个工具化过程中，理性不再执着于对自为价值的追求，而把这种价值具体分解在理性借以实现合目的性的行为过程中。具体到道德领域，价值理性注重知，而工具理性更注重行，只有人类道德活动本身才能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协调统一起来。具体到社会领域，价值理性强调政治和政权的道德性与合法性，而工具理性主要关注相应的政府体制是否完善并行之有效，因此更注重有效性与合理性。所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亦可相应地称之为意义理性和实践理性。从哲学对意义世界的依赖中可以看到本体论，而从对现象世界的依赖中则可以分化出各种科学。这种特征直接造成各种自然科学从哲学本体论中解脱出谋求对现象世界的探索与解释。因此任何自然科学的有益成果中都包含着对世界的某种形而上学的揭示，但这种揭示绝不意味着科学可以取代甚至取消哲学。

与价值理性相对应，工具理性由于追求现实合理性从而可能造成价值迷失而失去整个意义世界，这一点为韦伯所特别关注，并把工具理性称之为追求过程的形式合理性，这种貌似合理的东西可以掩盖其幕后本质的不合理而沦为形式主义，变成新的理性的专制。为人类所不可或缺的道德的精神价值亦将丧失尽净。这样也就不难找到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价值非理性和道德虚无主义恶性蔓延的症结之所在。然而科学仍试图把宗教、哲学和其它观念文化都纳入自己的领域，从而形成一种科学主义的价值体系，这样科学不再成为工具和手段而嬗变为目的和价值追求。但是“科学是必然性的仆从，科学不是创造，而是服从，科学的基础不是

自由，而是必然。”^①同样不能寄望于科学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尤其是意义和价值定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活跃于西方并呈蔓延趋势的存在主义试图重新确立一个意义世界，醉心于对形式(工具)理性掩盖下实质(价值)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如同萨特悲观地看到的人与人之间互为工具性之不可避免一样，存在主义也没有最终确立一个终极的意义世界。至此，工具理性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从而也是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已昭然若揭。在社会文化中，工具理性集中体现为对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如果我们仅仅看到由于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崛起使哲学迷失了自己，忽视社会科学对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有益价值，不足以揭示工具理性在社会建构中的巨大作用。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社会进化论以及批判理性主义何以在近代西方产生，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马克思所预见的社会革命不曾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与工具理性统治地位的确立所不同的是，西方社会中的价值世界几乎全部让位于宗教社会学和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学派。由孔德和斯宾塞首创并建立的社会学，使得对社会问题的研究逐步摆脱了价值中心论的桎梏，真正进入具有客观性的工具理性化时代。不对西方理性化过程及其实质做深层的考察，把以上各种学理和思潮仅仅当作异己而没落意识(价值)形态而简单地予以否弃，只能使中国越来越失去跟整个世界哲学和文化进行建设性对话的资格。文化和哲学的工具理性化往往以价值非理性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正是韦伯毕生追求的“价值中立”境界。实际上在哲学乃至文化领域中，不能指望创立一种绝对的价值真理来涵盖甚至指导整个世界，价值一元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中国道德家致力推崇的“经世致用”理论迄今并没有出现。但在整个东方世界

① [俄]H. A. 别尔佳耶夫，自由的哲学，创造的意义(M)，莫斯科：1989年第267页，引自纳里莫夫：关于哲学发展道路的沉思。

仍然可以捕捉到对价值世界的严重依赖，这种依赖并没有贯彻到人们的工具理性行为之中，而在谋求一种外在的归宿。殊不料，东方世界所缺乏的并不是价值本身，而是把价值理性化到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实践即工具理性，这种实践需要理性主体充分拥有对自己的价值工具化的自觉，才能把价值变成有效的工具。

虽然工具理性仍有它不可克服的异化效应，但对于自然、社会抑或是人类精神问题的研究，却不可排斥工具理性的求实精神，这种精神不仅要使人们对置身其中的世界有所把握，而且要对自身有所把握，并在这种把握中进一步理性化出我们不断改善生存状态的有效手段——工具，以使我们自为的价值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价值自为地是符合主体需要的东西，而主体需要却又多种多样。当一种价值泛化成整体和社会性的东西时，则变为公意和公利，即公共价值或是社会功利，它是人类道德的基础，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正是由于价值的这种特征才决定了它有可能主宰理性而成就价值理性。各种观念文化中所包涵的伦理精神恰是价值理性的文化体现。存在主义深刻而独到地把价值定位在“欠缺”这一层面上。认为“价值的意义就是一个存在向着它超越存在的东西；任何价值化了的活动都是向着……对其存在的脱离。价值永远并处处都是外在于一切超越的，因而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切存在超越的不受限制的统一。”^①价值“是一切欠缺的所欠缺者，而不是欠缺的”^②。既然价值理性是“欠缺的”对理性（即欠缺者）的主宰，那么由“欠缺的”无限杂多性就可得知不可能有一种包罗万象的价值来统摄理性，亦即价值理性并非是绝对并永远可靠的东西。哲学家和自奉为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对人类未来的

① 萨特，存在与虚无（M），北京：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38-139 页。

② 同上书，第 139 页。

应然设想只能成为条件性的价值预设。价值理性一旦失去使其现实化的有效手段，亦即工具理性的中介，绝不能真正引导理性走向成功，而落入工具非理性的陷阱。

工具是理性借以实现价值目标的有效手段，是价值主导理性到达现实性的中介。这种中介在理性主义者那里被界定为实践，所以工具理性也称为实践理性。基于人的需要的社会功利要求决定了人的社会活动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层面上，必须把理论和价值体现在具体的实践中去，这种对行为及其进程的选择也就成了人的主体性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康德在实践理性中所重视的人的自由和权利，正是这种不仅包括价值选择，而且同时包含对通向价值目标的有效手段——工具选择的自由和权利。道德立法所以要以人的意志自由为前提，其意义正在于此。因此工具理性是理性的工具化和工具理性化的统一。工具理性所固有的这种现实性和实践性特点决定了它必须为现实的价值目标服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工具理性必须完成对价值的超越，这种超越只有在不以既定的价值目标为羁绊，并使理性成为一种有益的建设性力量时，人的理性精神才成为真正的工具理性精神。但对工具理性的这种超越性，非理性主义却作了莫须有的夸大，甚至早在道家思想中就有着对工具理性的广泛排斥，认为只有“绝仁弃智”、“绝巧弃利”方可使人类不致陷于形形色色的文化异化而复归于自然之道。存在主义所展见到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工具性之不可避免也几乎让人们自由失去了信心，这样以价值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和以工具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均无法单独担当起拯救人类命运的重担。

三

既然如此，似乎有必要对人类理性化的历史做一次重新的审查。我们既不必自负于理性主义者对理性的矜持，也不必自卑于非理性主义者对理性的懊丧。人类理性的历史或许才刚刚打开，其中的丰富的蕴涵仍有待我们去挖掘。当哲学家们慨叹哲学迷失自己的家园时，只是表明了哲学再也无法扮演世界百科全书的角色。已经形成的各种价值体系已经不能满足时代进步的要求。哲学更不能像宗教神学那样寄望于为人类提供“祛除巫魅，普渡众生”的终极关怀，同时也不能像实用主义那样沦为工具的仆从。包括宗教、科学和其他形式的观念形态在内，必须对理性做新的重建，以便使哲学更好地担当起真正属于自己的神圣责任。

理性既是文明与进步的根源，同时也是形形色色的文化异化的渊藪。尽管围绕理性在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争论已旷日持久，但在唯理论及其现代继承即逻辑实证论那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对“自然之光”的仰仗，便是得自于数理哲学中的理性公设与逻辑图式。如果因此导向经验论，无可怀疑地连理性也被经验化从而把人降格为动物。其实，自从理性取得了对宗教革命的成功，对理性的观念态度就已误入歧途。这就是，不是把理性看成是仅仅属人的东西，而视为世界的必然法则。同时，没有把人与生俱来的自由理解为存在的共生体，而异化为外在于理性的彼岸的东西。这样，人类永远被一种外在的自由所辖制：不是屈从于外在的自然必然性即规律性，单纯追求工具理性，从而失去人的存在所不可或缺的意义世界，便是屈从于自身对绝对自由的追求，驰骛于空幻的应然理想，使作为存在本身固有价值的自由也成为人的桎梏力量。结论无疑是这样的：自由先于存在从而内在于存在，作为集自在、自为、异在三位一体于一身，人具有三重性。因此自

由之于人更具有本体论价值。理性究其质不过是思维着、行动着的人的自由。这样我们不得不对唯理论所确立的理性原则打个颠倒，不是理性而是自由成就世界，不是理性造就自由，相反，是自由造就了人的理性。那么为哲学所无以究理的科学，不过是理性(人的自由)对自然(自在自由)的立法，道德、法、制度等观念形态不过是理性对人及其共同体——社会(自为自由)的立法。那么包括科学、宗教、哲学、道德等在内的观念文化，无疑只是理性对存在的立法，这些立法又必然以存在的自由为前提，立法过程一经完成，理性便借助其异化工具把这些本为自为的东西客观化成异在的东西，从而完成对人的异化。

因此，任何得自于理性的东西，都不过是发展着的人的自由的体现。理性不仅相对于某个有限的客体，而且也永远相对于以自己作为工具的有限的主体。这样，理性固有的相对性与有限性应当十分清晰了，工具与价值的相对性也已不证自明。

自由作为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需要以全新的面目进入理性领域，并对其做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的扩展，这样各种现实的存在都将取得它们的合法地位，各种自为的价值将不再成为唯一正确和合理的东西从而也就失去了对人类不必要的羁束，由这种价值实现开始，各种真正有助于人类自由实现的现实途径即工具亦将被挖掘和探索出来。工具理性的异化也将逐渐归于消失。人类既不必由于价值理性的异化而跌入工具非理性的陷阱，使自己的家园成为一个失乐园，也不必由于工具理性的异化而陷于精神危机，使人类复又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

针对价值与工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理性与非理性等一系列极为复杂的问题，进一步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挖掘，对于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就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为此，才有以下关于《价值与工具》问题的对话式探讨，尽管参与其中的对话主体——沃斯(worth)与杜尔(tool)——是依照

著作的需要虚构的，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一议题和对该议题研究成果的价值。愿只愿这种探讨，能对人们实际生活、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各种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建设性的解决提供些许帮助。只是任何一种哲学和文化见解的提出，总难免避免随之而来的副效应，著者热忱欢迎读者和学界同仁，对本著的面世可能造成的副效应，提供理性的建设性的批判与克服，以求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

导 引

工具，作为人们实践活动所欲达到的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构成实践环节的重要方面。实践效果的合理性有着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共同要求。21 世纪已经来临，人类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宗教、道德等传统社会的观念整合力量日渐衰微，曾经独领人类文明风骚的西方技术理性亦正经受着来自各方面的诘难与批判，一些民族却又难以从传统社会的贫困中争脱出来。当是之时，对工具与价值及其理性化问题进行一番探讨与研究，不仅对中国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对整个人类文明的长足进步，也十分必要。

沃斯(Worth，以下简称沃)：杜尔先生，看到你名为《工具、价值与理性重建》^①的文章，读后觉得很有意思，却又似懂非懂，什么工具理性，价值理性，而且还有各自的异化等等。我虽然对哲学有强烈兴趣，但对你文中的概念却把握不准。希望你能较为通俗地解释一下。

杜尔(Tool，以下简称杜)：谢谢你对拙文的重视，就你提出问题而言，已算是部分地读懂了。说实在的，这个题目是我在考察南北问题的文化根源^②时偶拾得来的。尽管是偶拾，但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问题。早在我读大学时，在伦理学课堂上就接触到伦理学领域中提出的工具理性精神问题，那是在生态伦理学中。但在当时，我对这一概念的感觉大概跟你现在一

① 司汉武、吕卫东，工具、价值与理性重建(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一期，第 17-22 页。

② 司汉武，南北问题与自然文化(J)，人文杂志(西安)，1997 年增刊(2)，第 88-92 页。

样，只是在我发现问题以后，思考才渐渐深入了一些。这个问题我本想会招来一些非议，却没有，看来是我的文风使问题复杂化了。要回答你的问题，我以为还得从分析概念入手，你有时间和耐心吗？

沃：不要紧，你慢慢说吧，不过我想还是从你所说的工具开始吧！

杜：好的，不过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我那篇文章在谈到工具时，总是与价值相对应的。所以，把工具和价值两者任何一个单独抽出来解释清楚总是困难的。

沃：那就按照你认为最方便的办法说吧！

杜：实际上，你已经对工具作了说明，但你不曾意识到。

沃：我不知你指什么。

杜：你不是说，让我按照“我认为最方便的办法”说吗？你所说的办法正是工具。

沃：这就是工具？我的确没有意识到。那与它相应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杜：你不是让我回答你的问题吗？那么，“你的问题”不就是价值？

沃：哦，原来是这样。但我还是不大明白。那还有别的工具和价值？

杜：当然有。人类总是处于工具和价值之中，但往往又不曾意识。因为人类对越靠近自己的事物了解得越少。这种对工具和价值太过具体的解释，显然难以令人满意。那么我们还是从抽象点的角度来看吧！实践你该很熟悉吧！

沃：难道工具、价值与实践有什么关系吗？

杜：不仅有，而且有很大关系。

沃：我只从哲学教科书中得知，实践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动的客观物质活动，而且是社会性活动。但似乎从未注

意到实践与工具、价值有什么关系。

杜：不错，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实践的这种界定无疑是正确的，但教科书在对实践进行哲学揭示时，却往往不应有地忽视了其中至关重要的结构性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对于深化对实践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

沃：关于实践的结构性内容究竟是什么？

杜：这就是实践的目的、手段与结果。但在实践的概念界定中把这三者都忽略了。其后果是实践仅仅成了一种口号。其实实践首先是人们有目的的活动，否则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如同钻在玻璃瓶中找不到出路的苍蝇一样到处碰壁。从这一点来讲，实践固然是客观物质活动，这只是从其外在特征来看的，实际上，实践首先是主体有目的的主观活动，这其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其次，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必然要选择一定的手段，而手段的选择总是以能够有效地实现目的为前提。为着一个目的，可供选择的手段很多至少不止一种，但哪种手段最为有效，同样是主体的一种主观选择，因此选择手段的过程同样包含着主体的主观活动。最后，实践的目的是否达到，要通过结果来体现。可以说，结果是实践活动的最终归宿。但是结果如何，不单纯取决于实践的目的，更重要地取决于选择和采取的手段。这样，也许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综合的答案了。

沃：是不是说，目的就是价值，手段就是工具？

杜：正是这样，不过需要补充一点，在把目的、手段做了向价值、工具的转换后，相应的结果就需要转换为效果，两者虽为同样的东西，但论域、内涵及侧重点则会有所不同。比如关于结果和效果，前者侧重于实践活动的客观成果，而后者则侧重于主体对成果的评价。

沃：把目的和手段分别称之为价值和工具应该是可以的，但